

中国能够发展起一种亚洲愿景吗

[新]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表现，并对日后中国构建更为出色的亚洲邻国战略提出建议。本文认为，中国为保证中日关系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应考虑采用“超常规”思维处理将来的中日关系；在共享繁荣的精神下，中国与东盟建立起稳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日后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可以考虑构建中国、东盟、日本、印度四方伙伴关系；中印将成为21世纪的世界强国，两者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巴基斯坦的稳定和发展等问题上应积极合作。

关键词：中国的亚洲邻国战略 中日关系 中国—东盟关系 中印关系

以任何客观的地缘政治能力指标衡量，中国都是世界上在地缘政治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中美关系便是最好的佐证。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今日之美国）与最强大的新兴国家（今日之中国）之间一直都是剑拔弩张。按照这一历史性逻辑，美中关系也应当十分紧张。可事实恰恰相反，某种程度上而言，中美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这种地缘政治的奇迹缘何出现？简单来说，那是因为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成功运用了一种出色的地缘政治战略。笔者已在最新出版的拙著《新亚洲半球：不可抗拒的全球力量东移》中评述了这一出色的战略。不过，中美关系并不是本文的主题。这篇文章希望探讨的问题是，与中国对美战略（一直非常出色）相比，中国的亚洲邻国战略只能说“不错”，而并非“出色”。为何后者不能同

与中国对美战略（一直非常出色）相比，中国的亚洲邻国战略只能说“不错”，而并非“出色”。

[新] 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样出色呢?

首先要强调的是,中国在处理与亚洲邻国关系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值得称赞。与当今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驾驭这些关系的能力非常突出。既然中国可以出色地构建中美关系,那么中国在亚洲也一定能有同样卓越的表现。

在亚洲,考察每个国家地缘政治表现的最优指标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值得中国给予特别关注,那便是“信任感”。年复一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信任感是增加还是减弱了呢?目前,我们尚缺乏客观有效的方法去量度国家间信任感的消长。一些全球性组织曾做过很多出色的民意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却莫衷一是。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与东亚研究院(韩国)合作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亚洲邻国更加信任美国,而非中国。无独有偶,74%的日本和韩国民众都担忧中国将成为一个军事威胁。此外,当按照0—10度量指标评估美国和中国向亚洲民众推广政策的有效性时,日本(6.2)、韩国(6.1)、印尼(7.1)和越南(6.8)的民众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做得更好(上述国家对于中国的评估指数分别为4.8、5.0、6.6和6.7)。¹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结果显示,70%的日本人,43%的印度人和42%的巴基斯坦人对中国持消极看法。²

亚洲邻国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感在不断增强,对此中国不应感到意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多国家都会对毗邻它们的新兴强国充满不信任感,因为它们害怕后者践踏和伤害其利益。

由此可见,亚洲邻国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感在不断增强,对此中国不应感到意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多国家都会对毗邻它们的新兴强国充满不信任感,因为它们害怕后者践踏和伤害其利益。冷战中,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作为苏联的邻邦,中国也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显而易见,苏联曾是中国非常难以应对的邻国。但是与苏联相比,中国的邻国战略要好得多。在很多方面,中国对邻国的政策恰恰与苏联相反,中国一直坚持与邻国共享繁荣的原则。贸易额的增长是中国期望与邻国发展双赢关系的最具体的例证。1990年冷战结束时,中日贸易额(以美元计,下同)是160亿,中韩38亿,中国和东盟71亿,中印2.6亿。15年之后的2005年,上述双边贸易额分别是2133亿,1110亿,1304亿和200亿。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它是中国选择与亚洲邻国共享繁荣的明智之举的结果。

中国与所有邻国以及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本身便是非凡的成就。中国与外部世界扩展贸易的决心与那种传统的中国文明模式(贸易关系的最小化)大相径庭。研究中国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如此评述传统中国对待贸易的态度:“在中国的思维中,对外贸易是从属于朝贡的,这看似反

1 Whitney, Christopher B. and Shambaugh, David (2008):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f Global Affairs and East Asia Institute.

2 N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6): "Publics of Asian Powers Hold Negative Views of One Another, China's Neighbors Worry About Its Growing Military Strength", September 21.

常，但实际上的确如此。贸易仅仅被当成给予夷人的一种恩惠，是中国显现其慷慨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无疑，这种堂吉珂德式的狂想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轻商特性。在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根本比不上依赖土地过活的农与士。整个帝国不需要外部的供应便可以自给自足，这或许增强了它的轻商特性。不管怎样，外贸问题根本不是值得帝国高层考虑的问题，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规制在官方文书中被反复提及，一直延续至19世纪。”¹显然，中国已经成功地超越了传统和文化对其的束缚，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毫无疑问，当中国决定开放国内的市场，与所有邻国确立紧密关系时，自有一番充分的地缘政治考量，包括防范美国的遏制战略。

中国已经成功地超越了传统和文化对其的束缚，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当中国决定开放国内的市场，与所有邻国确立紧密关系时，自有一番充分的地缘政治考量，包括防范美国的遏制战略。

当今，中国面临的难题是，即便与邻国的贸易关系显著发展，但是国家间的信任感却没有相应提升。因此，中国需要全面反思与其重要邻国的关系。无论如何，中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还是相当不错的。关键是，中国在与亚洲邻国打交道时如何能从“不错”变为“出色”。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分别考察中国与它的重要邻邦日本、东盟和印度的双边关系。从这些双边关系的考察中，我们最能看清中国外交的得失。每一个部分，笔者也就中国如何能够做得更好给出一些建议。

一、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是中国与邻国关系中最为棘手的。1931—1945年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创伤尚未抚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太过麻木，因为后者还没有对其在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做出诚恳道歉。小泉纯一郎在2001—2006当政的六年中，每年都去供奉着250万战争亡灵，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这一做法惹怒了中国人。2005年4月，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发布引发中国国内轰轰烈烈的反日游行，这一历史教科书淡化了日本在甲午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的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和“二战”中的军事侵略性质。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的持续低迷也便颇为合理了。199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江泽民与每一位日本高层官员会面时都就日本掩饰“二战”罪行的做法给予批评。在日本发表的公开演讲中，江泽民对日本迟迟不愿对“二战”中的侵华行径做出彻底道歉表示不满。在与日本议员的会面中，江泽民提出日本在对待侵华问题时应该以史为鉴。江泽民表示，“中日两国唯有以

1 Fairbank, J.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Far Eastern Quarterly* 1, p. 139.

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两国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关系。”¹

许多新闻报道表明，中国原本期望日本政府能够在江泽民访日期间给出一份书面道歉。中国一相情愿地认为，日本首相和天皇曾在当年10月份对来访的韩国总统金大中做出正式道歉，日本对中国也会这么做。然而，这种愿望落空了，江泽民在东京得到的不过是小渊惠三“深深歉意”的普通声明，而早在1995年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便已经做过此类声明。当时领导一个联合政府的村山虽然属于进步的日本社会党，但他还是拒绝将这一声明纳入正式的联合公报。在江泽民访日期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声称，日本已经对其在中国的战争做了足够多的道歉，而且那场战争不过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造成的。²因此，在江泽民结束访日时两国没有发表什么联合公报就不足为奇了（1998年，中日曾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译者）。

尽管中日之间存在诸多困难和紧张，但中国领导人还是成功地保障了两国关系不至完全脱轨。2007年4月，温家宝对日本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将中日关系拉回了积极的方向。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了一篇既能为中国的嫌日派所接受，又能取悦充满疑虑的日本民众的演讲。他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技巧，以个人之力迎接了这一挑战。温家宝对在日华侨表示：“我做了很多准备。每一句话都是我亲自写的，我也亲自做了所有的研究工作。为什么？因为我感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³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我们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⁴

中日关系中内在的政治痼疾与巴勒斯坦—以色列、希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甚至美国—伊朗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相类似，困难重重、十分棘手。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伤痕（当人们想到战争期间几千万中国人被日军杀害时）要比其他关系更加深刻。然而，与邻国维持良好关系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努力确保中日关系的稳定。

1 Cherian, J (1998): "A Guarded Engagement," *Frontline* 15, No. 26, 19, December 1998—1, January 1999.

2 Ibid.

3 Lee Kuan Yew (2007): "Post-9/11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Pacific," *Forbes*, 18 June.

4 Speech by Premier Wen Jiabao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Japanese Diet, 12 April 2007, <http://www.mfa.gov.cn/eng/zxxx/t311107.htm>.

总之，中国已经为维护与日本的良好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中国需要再进一步，它需要理解为何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崛起如此不安。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40年之后日本在军事上远胜中国，这是它能够侵略中国的原因。然而，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几乎在各个领域，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偏向中国。军事上，中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日本不是（尽管很多人相信日本是一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经济上，虽然日本的经济规模目前仍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已经从1988年的前十名之后跃升至2008年的第三名，而日本始终都是第二名。日本遭受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经济停滞，中国却在这一时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不过是早晚之事。

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日本的不安全感将会大大增强，特别是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在世界上最为严重。随着日本不安全感的持续上升，中国也需重新考虑它的对日方针。当日本经济规模远远大于中国的时候，日本人可以接受中国对日本“二战”中行径的批评。但是，当中国成为更大经济体后，如果它依然对日本进行批评，这些教训就会深化日本的不安全感，并驱使他们考虑采取极端做法。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很难说某个赞成日本核武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右翼政党不会出现，那将是中日关系最为不利的前景，将给两国带来很多困难。同时，中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促使日本政治圈提升对华信任感。推动广泛的民间交流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两国师生交流、互办艺术展览、扩大旅游和贸易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加强的。

美国人在管理学方面贡献了很多出色的想法，比如，在应对非常情况时，他们常常倡导采取一种“超常规（Out of the box）”思维方式。在过去的数年中，中国一直试图在亚洲的不同地区，包括东南亚，与日本在影响力方面一争高下。如果采取“超常规”方式，中国可以在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时同日本合作，而非与之竞争，这将会使日本着实感到惊喜。中国已经和东盟构建了良好的关系基础，这一基础也可以用来加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东盟、中国和日本之间健康的三方伙伴关系将会极大地发挥稳定东亚的作用，也可以让中国的东亚战略显得“非常出色”。

中国已经为维护与日本的良好关系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中国需要再进一步，它需要理解为何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崛起如此不安。

当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日本的不安全感将会大大增强，特别是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在世界上最为严重。随着日本不安全感的持续上升，中国也需重新考虑它的对日方针。

中国已经和东盟构建了良好的关系基础，这一基础也可以用来加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东盟、中国和日本之间健康的三方伙伴关系将会极大地发挥稳定东亚的作用，也可以让中国的东亚战略显得“非常出色”。

二、中国—东盟关系

如果想了解中国在处理与东盟关系时有多么不错，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中国—东盟关系与欧盟—土耳其关系做一番比较。欧盟没能与它的重要邻国土耳其构建起建设性的长远关系，而中国与东盟却成功建立了这样的关系。客观来说，如果人们在欧盟—土耳其和中国—东盟关系哪个本应更好这个问题上打赌，可能前者更有胜算。欧盟富足且有实力，土耳其也一直强烈希望加入欧盟，这本应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仅仅在1979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前，中国与东盟这样一个亲美反共，且有反华倾向的国家集团之间敌意重重。然而，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系已经从相互敌对变为亲密伙伴。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相继访华，中美开始接触并越走越近。在此背景下，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第一次得以缓和。80年代，东盟和中国在反对越南侵占柬埔寨问题上密切合作，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东盟失去了兴趣并与其渐行渐远，但是中国却继续奉行与东盟修好的策略。特别是，中国为帮助东盟渡过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承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下，北京并没有让人民币贬值，而是将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始终维持在8.3:1的水平。如果人民币贬值，就像1994年贬值33%那样，中国出口的成本就会降低，但同时也会损害深受金融风暴影响的东盟国家为恢复经济做出的努力。此外，印尼和泰国是在这场金融风暴中遭受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分别为它们提供了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这场危机中，美国还未伸出援手却早已退缩不前，许多东盟国家对此记忆犹新。而同样具有刺激经济恢复实力的日本也没有像中国那样鼎力相助。美国和亚洲国家都呼吁日本增加从亚洲邻国的进口以帮助后者纾困解难，可是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却说：“日本需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我们还没有自负到把自己当成亚洲龙头老大的地步。”¹

中国决定对东盟施以援手，并非仅仅出于利他主义，也有精明的地缘政治考虑。时任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表示：“我们在经过得失利弊的权衡之后决定不贬值，这是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或许会影响中国的竞争地位，但是我们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理查德·哈勒兰（Richard Halloran）曾是《纽约时报》驻亚洲和华盛顿的记者，他认为：“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从这场经济危机中看到了提升中国地位的良机。北京试图恢复中央王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力，并逐渐施加政治压力以迫使美国从这一地区撤出武装力量。”²哈勒兰的话再次印

1 Halloran R. (1998): "China's Decisive Role in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Beat Issue Brief*, No. 24, 27 January.

2 Ibid.

证了转危为机的中国式智慧。中国利用1997年的经济危机获取了长久的政治利益。与此相反,美国却被短期的政治考量所左右。

中国通过另一个慷慨的大礼让东盟与它走得更近。在2001年11月举行的东盟—中国峰会上,中国总理朱镕基主动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着实让东盟国家领导人深感惊异。为了展现诚意,中国甚至在和东盟国家谈判时主动做出单方面让步。中国对东盟国家包括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在内的600多种农产品免征关税,让东盟国家能够“提早获益”。中国以破纪录的最快时间完成了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这又一次展现了它的诚意。在这一构想被提出的一年后,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就于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八次东盟峰会上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将在十年内完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首先与东盟初始六国——文莱、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实现自由贸易;2015年之前再与东盟中欠发展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完成自由贸易区建设。在东盟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但是中国却将给予这些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得以完全实施之后,一个拥有17亿人口,综合国民生产总值达1.5兆—2兆美元的共同市场将会出现。即便中国不做出慷慨的单方面让步,仅仅是主动提出这样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就已然是一个壮举了。东盟和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很多资本主义经济体已经建立很长时间的“对话”关系。一直以来,东盟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也远高于它和中国的贸易额。从经济角度而言,东盟和这些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同性(Synergy)要远比它和中国之间的高得多。在十年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中国竟然会主动提出这样一个方案。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区仅仅是一个贸易方面的安排,但是在实践中,它却能体现一种战略意涵,即双方认为构筑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以及彼此力量的增强符合它们的长远利益。美国之所以决定将墨西哥揽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其实是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虑,即如果美国不帮助墨西哥发展经济(美国甚至以牺牲很多就业岗位为代价),将有更多偷渡者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因此,从经济角度而言,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表面上短期受惠颇多,但实质上美国才是最大的得益方,因为它从此不必再为家门口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不稳定的邻国而担忧。

同样,中国在向东盟主动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时也有类似的现实地缘政治考虑。中国通过促进东盟经济的发展保证自身体境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但是,这一决定也受到其他地缘政治考虑的影响。中国看得很清楚,它的稳步崛起总有一天会让当今世界的第一强国——美国,感到惊慌。如果美国在某一天突然“觉醒”,并决定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对崛起中的中国下手,它可能就会利用东盟国

中国利用1997年的经济危机获取了长久的政治利益。与此相反,美国却被短期的政治考量所左右。

如果美国在某一天突然“觉醒”，并决定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对崛起中的中国下手，它可能就会利用东盟国家围堵中国。为了先发制人地应对美国的遏制，中国需要与它的东盟邻国共享繁荣。

家（很多东盟国家都是美国在冷战中的盟国和友邦）围堵中国。因此，为了先发制人地应对美国的遏制，中国需要与它的东盟邻国共享繁荣。正如美国分析人士乔舒亚·克兰茨科（Joshua Kurlantzick）所言，中国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如今已很有影响，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它的吸引力在一个重要地区被其他国家盖过。”中国目前为菲律宾提供的援助是美国对菲援助的四倍；在中国留学的印尼人要比在美国读书的印尼人多出一倍。¹ 因为与中国之间经济联系紧密，东盟国家不愿意加入任何针对中国的遏制计划。盛立军在分析中国的东盟政策时认为：“中国在看待当今这个复杂世界的时候，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采取简单化的

的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态度，这使其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东盟的政策，并为外交增添了很多灵活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采取主动。”²

如果欧盟可以像中国那样从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问题，它就应该主动提出与北非、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邻国建立自由贸易区。除了加深欧盟成员国的内部合作之外（从保护欧盟对外利益的角度而言，这种做法的长期效果值得怀疑），欧盟本应该尽力通过与其邻国共享繁荣来扩展自身发展的影响力。虽然欧盟经济的规模和实力超群，但是欧盟经济繁荣发展的影响力并没有向它的南部邻国扩展。这是欧盟内部缺乏长远战略思维的结果。很多欧盟官员将会非常激烈地驳斥这种说法，他们会摆出欧盟给予邻国的巨额援助，以及和邻国签署的各式伙伴关系协定，和由欧盟组织的，包括地中海邻国在内的数次峰会。也许欧盟真的不想消极对待它的邻国，但是如果仔细考察欧盟对邻国的实际影响，我们就会发现欧盟在共享繁荣方面几无成效。在某种程度上，欧盟实行的巨额农业补贴制度给邻国造成了不小伤害。

我们以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也就是巴塞罗那进程计划（Barcelona Process）为例。该计划于1995年11月启动，其宗旨是为欧盟与十个北非、中东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摩洛哥、巴勒斯坦当局、叙利亚、突尼斯和土耳其）建立新型地区关系打下基础。这一计划的最大目标就是于2010年之前在地中海两岸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然而，2005年由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一项研究，名为“欧盟的扩大对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欧盟与这十个伙伴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持续增大。的确，这十个国家GDP的总和仅仅达到西班牙一国的水

1 Rachman, G. (2007): "Wal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Purse," *Straits Times*, 23 February.

2 Lijun, S. (2003):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orking Pape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Security Issues Series No. 1*.

平。这一研究指出：“欧盟和其他地中海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一种不均衡的相互依赖，使得欧盟在这一计划的所有谈判中都居于上风。”

与此同时，欧盟开始为它的那些未来成员国提供大量的技术和财政援助。2004年5月之前，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还只是欧盟的伙伴国，如今已经正式加入欧盟。此外，还有其他八个国家变为欧盟的成员国：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截至2003年，这些新加入国家每年可以从欧盟获得人均545欧元的补助，但是南地中海国家得到的只有区区人均14欧元。因此，与巴塞罗那进程计划中的那些地中海伙伴国比起来，欧盟的新成员国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地中海伙伴国的收入总和仅仅是这些欧盟新成员国收入总和的十分之一。¹

根据非政府组织“中东大地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Middle East）”和“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的调查，凡是来自南地中海国家、且优于欧盟产品的农产品，大多受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限制。对这些水果蔬菜征收的关税根据产品和季节的不同涨落起伏，但是在进口产品与欧盟本土产品相竞争的时候，前者通常被征收最高关税。橄榄油是一个突出例子，如果每年欧盟的橄榄油生产商不是因为共同农业政策而获得高达23亿欧元的补助的话，²他们其实很难与南地中海国家的生产商一比高下。埃及发展研究所的让·莫塞朗（Jean-Yves Moisseron）认为，欧盟委员会承诺的给地中海地区国家的财政援助与双边协议中规定的财政援助并不吻合。目前，后者的数额要比欧盟委员会提供的高出五倍。他同时也指出，在执行巴塞罗那进程计划的十年中，双边援助有所下降，而且下降幅度超过欧盟援助增长的幅度。另外，他声称，这些援助中只有40%能够真正兑现，但是来自美国的援助却可以在规定年度100%给付。³

要想考察一个国家或国家组织的地缘政治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检验它们政策的实际效果，而不是围绕这些政策理论上的好处争论不休。中国的例子表明，它与邻国共享繁荣的政策确实行之有效、影响显著。中国的崛起正在使它的邻国不断获益，而非受损。相比之下，欧盟的成员国从15个增加至27个（新成员从欧盟获益不少，当然其中一部分好处来自于欧盟给他们的慷慨施舍），但是欧盟在它的周边地区却没有发挥什么积极的影响。北非与欧盟的经济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

中国的例子表明，它与邻国共享繁荣的政策确实行之有效、影响显著。中国的崛起正在使它的邻国不断获益，而非受损。

1 Crawford, B. (2005): "The Impact of EU Enlargement on the Euro-Med Partnership,"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 5 No. 23, July.

2 Byrne, K. (2005): "Euromed: An Economic Failure?" Cafebabel.com, 28 November 2005, <http://www.cafebabel.com/en/article.asp?T=A&Id=1545>.

3 Wahish, N. (2005): "On the Wrong Foot," Al-Ahram (online), 28 April-4 May, Issue No. 740, <http://weekly.ahram.org.eg/2005/740/ec3.html>.

20年之后欧盟在维护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时会表现不佳,而中国将在世界上“跑赢大盘”。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种历久犹存的西方逻辑,所谓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自然优于亚洲国家。

大,而不是缩减。这种结果实际上反映了欧盟在地缘政治表现上的失败。

在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欧洲满怀信心地阔步走向未来,而中国却因为北京政治风波陷入谷底。当时,没人敢预测,20年之后欧盟在维护长远的地缘政治利益时会表现不佳,而中国将在世界上“跑赢大盘”。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种历久犹存的西方逻辑,所谓西方国家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自然优于亚洲国家。实事求是地讲,亚洲人正在向外界证明自己完全可以贡献一种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

中国已经为与东盟关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它需要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中国应当利用东盟的地缘政治优势提升它在亚洲的地位。之前我曾经提及,中国可以考虑推动建立东盟、中国、日本之间强有力的三边伙伴关系。如果印度能够参与进来,这种四方伙伴关系将会更加稳固强健。

三、中印关系

如果中日关系是中国过去最棘手的双边关系,那么将来中国外交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便是如何处理中印关系。原因很简单,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崛起强国。高盛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到2040年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将依次是中国、印度、美国和日本。如果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重要的崛起强国之间出现对抗,我们并不会感到意外。

很多西方人士很难相信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世界上的头两号国家。但是,英国经济史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ison)告诉我们,公元1—1820年,中国和印度始终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因此,我们将在21世纪见证一个历史的轮回,过去200年西方对世界历史的掌控不过是历史的偏轨,我们应当翘首以盼亚洲国家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亚洲新时代,中印关系举足轻重。

过去200年西方对世界历史的掌控不过是历史的偏轨,我们应当翘首以盼亚洲国家成为世界最强国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亚洲新时代中,中印关系举足轻重。

然而,中印之间想要发展一种亲密关系并非易事,原因在于:首先,崛起中的强国很自然地倾向竞争而非合作;其次,1961年中印边境战争尽管短暂且规模不大,却给印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结;第三,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度实际上站在了对立的阵营;第四,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激烈对抗中,中国一直都是更多同情后者;第五,由于历史原因,印度

总是高度提防中国针对印度的政策。因此,当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 - NSG)开会讨论是否通过美印核能合作协议的时候,印度认为中国试图

从中作梗，尽管中国已经对此表示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中印关系呢？笔者要重申的是，中国其实已经处理得不错了，只是可以做得更好。当前的中印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首先，中国和印度已经非常明智地决心要把精力放在提高两国贸易关系方面。中印之间的贸易关系得以显著发展。2003年，两国确定了在2010年前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一目标很快便实现了，如今中印已经把这一目标升级为600亿美元。其次，在很多国际场合，中国和印度已经就涉及彼此共同利益的问题展开了合作。2008年多哈全球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和欧盟都极力指责中国和印度应为此负责，而中国和印度则采取共同立场与之针锋相对，它们表示，谈判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美国和欧盟拒绝削除农业补贴。第三，中国和印度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共同的挑战。很多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工业化导致了现在的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之所以出现并不仅仅因为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新“流量（flows）”，我们应该考虑西方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排放的温室气体“储量（stock）”。简言之，气候变化是一个关乎“流量”和“储量”的问题。可是如今很多人一提到温室气体排放，他们就只想到“流量”，并自以为这便是问题的根源。然而，我们所担心的温室气体效应并非源自近期的排放，虽然近期的排放确实使得这一问题逐渐恶化。气候变化的根本性原因还是西方发生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里所累积的排放量。因此，只有依据“储量”和“流量”分担责任，我们才能够合理公正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总而言之，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世界上，中国和印度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可以成为中印关系实现稳定的基础。但是，如果中国想要和印度更加亲密，它就需要寻找新的机会，所幸时机已至。

这个机会和巴基斯坦相关。巴基斯坦有可能沦落为一个“失败国家”，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危险之一。很多西方分析人士已经开始公开谈论这种可能性。最近，一份由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主持撰写的报告强调说，“……首要问题是，我们需要对当今的巴基斯坦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理解，而且也需要认识到它正在迅速滑向一个接近失败的，或者是已然失败的国家。”¹ 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曾经将巴基斯坦和20世纪70年代的伊朗相比较，他表示：“世界上第二大穆斯林国家变成一个被原教旨主义分子所掌控的失败国家，他们有核武库，而且人口比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朝鲜加起来的总和都要多，对于美国来说，这将是难以想象的、最大的噩梦。”²

如果巴基斯坦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失败国家”，那

如果巴基斯坦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失败国家”，那么对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巴基斯坦所有邻国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1 The Atlantic Council (2009): Needed – A Comprehensive U.S. Policy Towards Pakistan, February.

2 <http://www.msnbc.msn.com/id/21687583/>.

么对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巴基斯坦所有邻国来说,这都将是一个巨大挑战。倘若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中国、印度,还有美国都将大大受损。巴基斯坦政府,无论是文官系统还是军事派别也都将面临重创。因此,眼下防止巴基斯坦沦为“失败国家”符合美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共同利益。一旦巴基斯坦北部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占据,他们一定会同中国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分子沆瀣一气。如此一来,新疆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会加速蔓延,中国不应低估这一态势。同时,一旦巴基斯坦成为“失败国家”,美国稳定阿富汗的目标就会泡汤,而印度也会因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而遭殃,2008年11月26日发生在孟买的袭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美、中、印、巴要想发展合作,克什米尔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所幸,我们目前已经知道克什米尔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将会与中东问题相类似。印巴两国政府应该都会接受目前的控制线。不少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曾经私底下告诉我,在穆沙拉夫主政时期,印巴实际上几乎就快要达成一项以目前实际控制线为基础的和平协议。过去,特别是在冷战时期,一些中国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克什米尔冲突的延宕有利于中国的战略利益。可如今,地缘政治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克什米尔问题的和平解决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地缘政治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克什米尔问题的和平解决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将能极大提升中印之间的信任感。

由此,中国应该努力说服巴基斯坦政府积极处理这一问题。此外,中国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将能极大提升中印之间的信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印巴能够实现全面的关系正常化,经贸往来恢复常态,那么更多的积极影响将会接踵而至。在拙著《新亚洲半球》中,我已经论述了亚洲的现代化征程如何从日本起步,进而发展至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继之涵括东盟国家。在东盟之后,中国和印度也已经加入到这场现代化征程之中。紧接着进入这一征程的将是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如果

巴基斯坦能够成为亚洲现代化征程的下一站,它将会为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进入铺平道路。

如果中国能够在中、印、美、巴之间构筑起一种可以促进巴基斯坦稳定和现代化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中国便会将亚洲和世界历史带入一条异常光明的大道上。

中国和印度(其实也应包括美国)将会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中获益良多。伊斯兰世界的年轻人过去曾经渴望支持各类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但是今后他们将会集中精力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就像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年轻人那样。如果中国能够在中、印、美、巴之间构筑起一种可以促进巴基斯坦稳定和现代化的地缘政治伙伴关系,中国便会将亚洲和世界历史带入一条异常光明的大道上。中国的战略也不会像如今这样仅仅是“不错”,而会变得“十分出色”。

为了实现这一出色的战略构想,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跳出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窠臼。冷战时,中国与巴基斯坦为伴,而印度则站在苏联一边。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应该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从前的宿敌和对手都应清楚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过相互冲突的利益。对于很多战略思想家来说,这种想法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很多地区已经实现了这种地缘政治对抗的超越。以欧洲大陆为例,英、法、德之间你死我活的混战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20世纪最为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发生在欧洲。在经历了数百年军事冲突之后,现在的欧洲已经很难再发生什么战争了。这便是欧洲大陆所创造的辉煌的文明成就。在中国的领导之下,亚洲也可以创造这种文明成就,届时任何两个亚洲国家之间都不会再会爆发战争。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与邻邦共享繁荣的政策已经为这种宏愿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亚洲地区战争几率不断减小的一大原因。如今,我们要继续努力,像欧洲那样,让亚洲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本文为中国提出了一些可供思考的政策建言。首先,中国可以在东盟、中国和日本之间构建起强有力的三边伙伴关系;再者,它可以通过吸纳印度,使这种三边关系得以扩展。澳大利亚曾经提出一种想把自己包括在内的“亚洲强国新集团”构想,这一构想实际上反映的还是那种19世纪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欧洲式思维,中国不应该赞同这样的构想。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以正和博弈代替零和游戏的21世纪新思维。在这种正和博弈的精神下,中国需要与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密切合作,努力促进巴基斯坦的稳定和现代化。

总之,中国如果想让自己的亚洲战略从“不错”迈向“出色”,实际上大有可为。倘若中国能将出色的亚洲战略和出色的对美战略有机整合,那么它势必将为21世纪世界历史的光明未来做出巨大而积极的贡献。

中国与邻邦共享繁荣的政策已经为这种宏愿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亚洲地区战争几率不断减小的一大原因。如今,我们要继续努力,像欧洲那样,让亚洲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以正和博弈代替零和游戏的21世纪新思维。

倘若中国能将出色的亚洲战略和出色的对美战略有机整合,那么它势必将为21世纪世界历史的光明未来做出巨大而积极的贡献。

(赵明昊 译,于铁军 校)